首届中国女社会学家论坛

**演讲提要**

目录

[福祉：社会建设的理念目标与实践逻辑——以儿童教育福利资源分配为例 1](#_Toc370390580)

[中国城乡消费鸿沟变化趋势——2001-2011 3](#_Toc370390581)

[The Radius of Generalized Trust in Contemporary China 4](#_Toc370390582)

[女性真的解放了吗——从农村女性记忆谈起 5](#_Toc370390583)

[家务劳动和家庭权力对女性家庭地位影响的再探讨 6](#_Toc370390584)

[冲突与协商：个体化时代代际权力关系的重建 7](#_Toc370390585)

[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 8](#_Toc370390586)

[情绪政治化：政治社会学解释 9](#_Toc370390587)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方式的历史选择与实践路径 13](#_Toc370390588)

[中国社会学十年间女学者的学术影响力研究——基于2003-2012CSSCI论文数据库 14](#_Toc370390589)

[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再思考——从“地位实现”看阶层、群体、圈子 15](#_Toc370390590)

[实现社会的自我发现 17](#_Toc370390591)

[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的关联性及其政策研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21](#_Toc370390592)

[女性情欲与自我表达：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性话语研究 22](#_Toc370390593)

[海市蜃楼中的核心家庭与现实中的个体家庭——家庭结构的“现代性” 23](#_Toc370390594)

[文化与国家——人类学家陶云逵眼中的边疆 24](#_Toc370390595)

# 福祉：社会建设的理念目标与实践逻辑

**——以儿童教育福利资源分配为例**

**彭华民**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工系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

**摘 要：**很多年前一个伟人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footnote-2)。如果说一个学科的理论知识体系是在解释世界，应用理论和知识去行动则是为了改变这个世界。如果说社会福利学科的理论知识是在解释我们的世界，那么，我们行动的目标就是为了通过福利资源再分配，消除或减少不平等，提升人民福祉。

福祉（well-being）的概念解释来自不同学科，最新的研究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社会福利等。福祉是人类有质量的生活，它是一个动态过程，包括五个方面：善思（well-thinking）、善有（well-have）、善避（ well-off）、善做（ well-doing）、美好的感受即幸福（well-felling）。人类通过建立社会制度来实现福祉。美好地拥有，包括家庭和密切的人际关系、收入与财富，教育与健康、住房与安全环境等；成功的行动使我们通过行动去获得拥有，去避免生活中的风险，避免对我们的伤害。善有中的教育既是善有的内容，又是善思、善有、善避、善做和幸福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中国日益重视社会发展，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环境建设共同纳入五位一体的政策框架。建设目标不是解决社会问题，其终极目标是提升人民的福祉。社会建设就是善做，通过建设去实现善有、善避和幸福。教育是社会建设的重要部分。教育可提升社会成员个人追求幸福提升福祉的能力。教育福利资源的公平分配是优质教育的基础，是中国社会建设的阶段目标。只有实现教育福利资源的公平分配，社会建设的终极目标—人类福祉才能得以实现。

教育是福祉中美好拥有和成功行动的重要内容，但聚焦中国儿童教育，发现其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儿童失学、儿童教育机会不平等、地区教育不平衡等。针对这些问题，本项研究的研究问题是：中国儿童社会福利资源不平等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系是什么？中国儿童教育福利资源地区不平等分布内容是什么？教育福利资源不平等分布结构是什么？本项研究的目的：勾画出对中国儿童成长最有影响的教育福利资源不平等分布的基本格局，指出教育福利资源不平等格局对儿童成长可能存在的影响，提出解决教育福利资源不平等分布问题的政策建议，本项研究的意义：为儿童福祉即善有、善做和幸福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支持。

本项研究的研究方法：采用定量分析方法。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库，以及相关的政府教育统计资料库。具体分析变量包括：（1）儿童人口变量：分行政省市、分城市县镇农村地区、分年龄人口变量，（2）经济变量：分行政省市人均GDP变量，（3）教育福利变量：分行政省市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教材与儿童读物等教育福利资源变量

本项研究发现：（1）中国儿童在地域分布上，农村儿童多于城市儿童。由于城市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以及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存在，给儿童带来了不可逾越的教育福利资源分布不平等的障碍。（2）统计分析发现，中国六个地区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的格局。中国儿童抚养比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关。抚养比越高，地区经济越不发达。地区儿童抚养比与地区人均GDP存在负相关关系。（3）中国儿童教育福利资源分布不平等是与经济发展不均衡格局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本项研究将教育福利资源分为三大指标：按教育福利资源内容可分为校舍、教学设备、师资；按照教育福利提供机构分类，可分为幼儿园、小学、中学；按儿童出版物可以分为种类和数量。统计分析发现，人均GDP和教育福利资源存在高度相关关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地区教育福利资源越丰富。生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儿童，不仅仅可能遭遇经济风险，也会遭遇教育福利资源缺乏的风险。因此，中国儿童教育福利资源不平等分布格局是：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梯度形成教育福利资源分布的不平等格局。

通过本项研究，提升儿童福祉的政策建议是：（1）实施政策倾斜，加强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福利资源投入，特别是对西北和西南地区的投入。（2）在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福利资源投入的同时，实施积极的人口流动政策，让缺乏资源地区的儿童通过流动能够获得优质的教育福利资源。（3）推动经济发展，通过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建设的发展，真正实现儿童善思、善有、善避、善做，提升他们的福祉。

# 中国城乡消费鸿沟变化趋势

**2001-2011**

**李春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摘 要：**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巨大的城乡差距。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实行户口制度，限制城乡人口流动，集中资源发展城市和保障城市居民福利，剥削农业收益和牺牲农民利益，从而导致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巨大鸿沟，这种鸿沟也表现在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方面。经济改革开始以后，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却进一步扩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居民消费支出数据显示，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城乡消费水平绝对差距为2倍，而2001－2005年进一步扩大到3倍[[2]](#footnote-3)。本世纪以来，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产业投资，提高农产品价格，免征农业税和免除农村9年制义务教育学费。这一系列政策导致农村居民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另外，最近十几年中国城镇化急速推进，部分城市周边农村居民从中获益，其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极大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城乡消费鸿沟发生了什么变化，是否有所缩小，或者仍就维持甚至扩大？这是本文想要解答的问题。

# The Radius of Generalized Trust in Contemporary China

**周怡 胡安宁**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Abstract：**Drawing on the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2011,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adius of generalized trust in contemporary China.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OLS and finite mixture models, we find the average radius of generalized trust in the urban population is wider than that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Besides, on average, married persons show a narrower circle of generalized trust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Minorities, better educated individuals in rural China and individuals holding a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tatus in urban China have a wider radius. There is a tradeof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and the radius of generalized trust and cross-cohort analysis provides preliminary evidence for a longitudinal extension in the radius of generalized trust over the past decades, especially after the launch of the reform and open-up policy. Finally, identity-based social participation significantly curtails people’s radius of generalized trust in urban areas.

# 女性真的解放了吗——从农村女性记忆谈起

**郭于华**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摘 要：**人们通常认为，传统中国女性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重压迫，处于社会最下层；因而女性的解放就成为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表征。不仅如此，女性也是这一宏大社会革命的重要力量。由此革命与女性解放就有了似乎不言而喻的相互性，参加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意味着女性的解放。然而，1949年以后的农村女性生活和记忆却展示出这种相互性的悖论：从家庭劳动者到集体劳动者，从家庭私领域进入村社集体，并非真正地从所谓“私域”走出并参与“公共领域”和“公共生活，这一过程其实是从一种被支配状态进入另一种被支配状态，是从家庭与宗族的附属品成为集体与国家的工具的过程。简而言之，被解放不是真正的解放。女性状况和关于女性的意识形态及话语，鲜明地体现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文明的机制和逻辑，其符号暴力（symbolic power）在其运作过程中，被支配者不仅接受、认可了它，而且对它作了符合自身认知特点的理解和解释。时至当今社会，对女性问题的理解仍未脱离上述符号暴力的制约，对今日女性状和性别意识进行分析，同样可以作为对一种文明性质的了解与洞察。

# 家务劳动和家庭权力对女性家庭地位影响的再探讨

**徐安琪**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摘 要：**本研究首先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资料对当前两性在家庭中的家务分配和婚姻权力作出大致的描述和分析。其次，在对夫妻权力的各种测量进行比较和反思的基础上，以“总体上讲谁在家中更有决定权”作因变量，通过资源概念的拓展、增加婚姻依赖和满足、文化规范等变量，以及将权力实施过程的操作化等设计成多维度的解释变量。再次，对家务负担和夫妻权力是否影响家庭地位进行反思，认为在微观研究中，将夫妻的家庭决策权作为男女家庭地位的主要测量指标，将面临如下悖论或困扰：一是丈夫权力越少、妻子地位就越高？二是权力和义务对应一致还是对立相悖？三是女性具有更多的权力还是双方的平等、和谐与家庭地位更相关？本研究以家庭价值观研究的经验资料，证伪家务劳动少、婚姻权力大有利于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分析结果显示，伴侣间的教育、收入等外显性的社会经济资源未呈显著性，而潜在的个人和家庭资源如为家庭付出更多、持家能力强和亲属支持多的被访有更多的决策权；依赖和需要婚姻的一方更愿意放弃家庭权力；当地的亚文化和文化规范对婚姻权力有显著影响。同时，更少做家务或有更多婚姻权力的一方未必对自己在家庭中的性别平等表示满意，是家务分配公平感而不是家务负担少，是个人自主权而不是相对的婚姻权力对性别平等满意感有预测作用。

# 冲突与协商：个体化时代代际权力关系的重建

**吴小英**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

**摘 要：**市场化以来中国社会和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变迁表现出相互矛盾的趋势：一方面，代沟日益明显、代际冲突日益加剧，表明既有的代际平衡模式已被打破；另一方面，家庭内部的代际互助成为一种常态，总体上表现为代际重心下移、代际关系向下倾斜的特征。如何解释这些矛盾现象？家庭内外的代际权力关系是否遵循同样的逻辑？个体化的兴起给这种权力关系走向带来怎样的影响，又如何在冲突与协商中重建它们的平衡？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文章认为，传统家长制模式的代际权力关系特征就是等级制和依附关系。市场化的出现导致权力的分化，年轻人有了用脚投票的可能，并在流行文化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既有的代际平衡模式之所以遥遥欲坠，就在于个体化的兴起所导致的观念和制度上的脱节。如何在冲突与协商中重建代际权力关系的平衡，只能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寻找答案。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权贵统治、国家无孔不入的时代，单项的权力关系讨论没有多大意义，因此代际权力关系的重建，不能离开外部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生态来议。这种新的权力关系的重建，可能促成基于代际平等的新的代际关系规范的诞生。

# 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

**金一虹**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教授）**

**摘 要：**持续规模化的流动已成为中国农民家庭变迁的重要结构性力量。流动带来的去地域化，侵蚀和破坏着血缘和地缘关系高度重合的中国父权制家庭，但其所致的家庭制度变迁不仅具有解传统作用，同时也是一个传统重构的过程。父权制家庭在解构中延续和重建，是体制约束、市场主导和父系父权自身延续的需要三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一流变的家庭形态不仅为“身在城市，根在农村”的流动农民提供了低成本生存发展的基础，也以其特有的弹性适应能力，成为应对农村社会因变迁而生的矛盾冲突的缓冲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消解社会紧张的作用。

# 情绪政治化：政治社会学解释

**张静**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摘 要：**

**（1）现象**

可以明显观察到一个日益突出的现象：社会情绪的政治化反应，它表现在：网络环境充满政治气氛，以及归因，倾向于将一切原因归为政治；社会冲突中，个人事件转化容易为群体事件，法律冲突容易转化为政治冲突；大量加入到群体事件中的人并无利益关系。

如何解释这些现象？除了经济学的“收入差异拉大”，政治学的“不平等加剧”之外，政治社会学建议我们观察社会中**公共与个体的关联结构**、以及**关联的通道**，通俗地说，就是人们依靠什么社会通道解决问题，他们是否可以经由公共组织，顺利获得公共制度的帮助、仲裁和保护。

**（2）原有的社会组织化结构**

上个世纪50年代，所有人都曾被组织到单位里。通过“单位”人们不仅能够工作得到工资，更重要的是结构关系的建立：人们获得了和国家公共制度的正规联系通道。

这意味着一种中国特有的公共-个人连接结构：直接接触社会成员的机构，实际上不是政府本身，而是它的“代理”机构——劳动所在单位：在城市是企事业等工作组织，在乡村是生产大队等劳动组织。作为和人们距离最近的公共组织，单位重新组织化了人们的公共关系，个人也通过单位和国家制度建立了制度化连接。

这种连接结构的特点是：通道的单一固定性

由单位（“代表”政府）负责回应人们的诉求。这种固定单一的责任隶属关系，使得人们和单位的关系成为唯一可及公共关系的通道，这样，有单位的人才可能接触到政府公共组织，并可能通过单位申请、要求获得公共制度的帮助。

政府责任的间接性：

社会管治并非直接地由政府、而是间接地通过单位进行。越过单位接触政府不是常规、而属异常现象，单位作为代理性机构，负责政府社会管理责任的具体实施。所以个人在外发生的事务，会通知领导“领回下属”回单位处理；单位职工在水电/暖气/税收/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公共需求，不用找政府，由单位负责解决。这意味着，对于普通人而言，一般的社会公共品的提供（政府职能），是由生产和工作单位代理承担、并实际供给的。政府工作对单位不对个人（对公不对私），公众和政府组织的直接联系实际上较少必要，因为单位代理了一切手续。政府的治理对象，是单位组织而不是公众。

辖区（管理权）的分割性：

单位代理政府职能服从权属分隔、属地管理的原则，它只对具有权属关系的登记人负责。这样，人们享用公共服务能否兑现，不是来自其国民身份和缴税义务，而是和其登记注册的地域和单位有关。尽管理论上人们的“资格和权益”相等，但每个单位都有属地和辖区，它并不负责单位和辖区之外的社会成员的事务。事务办理须“有组织联系”，它指必须是进入注册单位、隶属机构和辖区，才被体制承认，也才可能畅通有效。因为他们的注册信息在单位中。

**（3）局限**

这种连接结构仅对于静止不流动的（注册）对象有效，但显然无法处理频繁流动人员的信息，因为他们离开了登记的属地和辖区，也不一定有稳定工作。对于这样的人，等于失去了为其办理公共事务的具体责任机构，失去联系公共组织的制度化通道。为什么很多国企员工不愿意离开单位？这并非是简单的收入问题，而是和公共组织的负责机构连接的问题，一旦离开，他们就失去了负责其事务的公共代理机构。

这一管理体制实际上不需要、也没有在单位之外，发展出公共组织作为一个整体、回应公众或社会团体诉求的公共责任实施体系。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何很多公共组织习惯推诿**，**因为在上述结构中生长起来的政府责任，是组织汇报、研究和批准请示报告，下达指示、标准或拨款给单位，而具体执行和实施决定，由劳动单位负责。

如果换一个角度，观察责任分布体系，可以看到这一结构的本质，是公共管理责任的分化、分管和分包，各地各单位的公务人员不是一个整体，他不是代表整体政府、而是代表具体的属地单位在工作。这种位置使政府（公共组织）不愿、不能、实际上也不会做通常由单位代理的事情。政府出面往往是在突发事件出现，而单位又无能为力对付的时候。

**（4）社会结构变迁**

今天的社会结构已经变化。致使在基层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和公共组织（政府）之间的制度化连接中断。

这种中断，和两件事情有关：劳动力流动自选职业、单位的桥梁角色变化。过去单位作为“政府代理”的若干责任——回应成员需求，分配公共福利，兑现权利，调解纠纷，联系上级——等等职能减少了，它逐渐退出政府代理的职能，将管理的责任——“担子”卸给市场和社会。可以说，社会结构的变化，把旧体制下的公共责任配置，推向全面的危机的状态。

这一危机表现在个体和公共连接的结构性阻塞：很多社会成员和政府的联系不再畅通，他们失去了向上“请示”的组织成员位置（过去这一职能由属地劳动单位承担），作为个体，他们无法接近政府，无法依赖公共制度顺利处理事务，成了被排斥在公共制度保护之外的个体。比如，申请公积金，必须由单位实施；公共机构没有单位介绍信不能进入；公众有事向街道社区投诉得不到回应和解决；很多国家公共政策不回到单位或者辖区就无法兑现；很多人处于有事不知该找谁，有纠纷没人管，有求没有组织应的状况，没有单位出面，人们面临着没有公共组织向自己负责的局面。

这说明，在我们的社会中，出现了个体和公共连接通道和责任实施的中断。今天到处可以看到，凡保留传统职能多的事业单位，上述“中断”的问题就不那么突出，这和大量转变了职能的企业经济单位形成巨大反差。后者的状况，是人们逐渐被排除在公共组织的关照之外，失去了依靠公共制度的有效途径。

社会成员的广泛流动加剧了上述问题的严重性。但这绝不是流动错了，而是原有的管理责任体制没有进步的结果。产生于旧的管理体制的责任实施系统，还没有建立新的责任实施系统，来承担今天公共社会（而非单位社会）的管理任务：组织管理的责任格局依然如旧。

**（5）结论**

为何旧的管理失效？因为旧的公共-个体连接结构、以及旧的公共责任实施体制不适应新的社会现实。

为何社会情绪日益政治化？因为人们无法有效依赖公共制度解决自己的问题，于是他们的不满目标，从事件本身的具体对象转移到更大的对象：公共组织和制度的责任缺失，因为后者和所有的事件解决有关。

人们和公共制度的组织化联系中断，造成的后果是政治性的：公共组织的内聚力弱，其获得社会认同的中心地位建立不起来，因为它和人们的切身利益缺少关系，用口语说，就是“不管用”，“指望不上”。人们自然希望改变这些公共制度，使其管用、指望得上。这是社会情绪政治化的来源。

如果公共组织和回应公共需要、利益诉求无关，不能成为公众的依靠和保护力量，人们就难以对其产生归属感，而且不得不寻找其他途径建立公共关系（这是我对宗教关系近年来大举活跃的解释）；甚至于，人们不得不建立发达的私人关系来满足其需要（这是我对私人关系效用广泛的解释）；在极端无奈的情况下，人们开始用个体力量或者“报仇”来处理纠纷（这是我对个人暴力冲突频发的解释）。

问题很简单，公共制度找不着，人们能依靠谁来解决问题呢

#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方式的历史选择与实践路径

**范斌**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管理学院教授）**

**摘 要：**本文重点考察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方式的演变过程，提出了以契约化程度以及竞争程度为标准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方式的分类标准。同时，针对目前多种购买方式并存的实际情况，从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改进，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分析了影响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方式演进的结构性潜力因素与结构性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对不同购买方式的特点进行了比较，就如何进一步优化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方式提出了具体建议。

# 中国社会学十年间女学者的学术影响力研究

**——基于2003-2012CSSCI论文数据库**

**闵学勤**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摘 要：**嵌入中国时代变迁的社会学女学者，其研究对社会学界及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贡献如何？融入主流社会学的程度如何？由此建构的学术影响力如何？本文基于2003-2012这十年中全部27086篇社会学专业CSSCI论文数据，全方位定量呈现了女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对女学者发文数量、发文期刊质量、研究方向，以及所在单位分布及地域分布等多视角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融入与男学者的相关比较。研究发现虽然十年间女学者对中国社会学界的贡献稳中有升，对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均投入了大量研究，并适时展现了女学者作为“他者”的存在价值及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但总体而言，十年里发表CSSCI论文的4273位女作者，其共同的耕耘仍属于社会学界的边缘化建构，特别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和《社会》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女性比偏低，在22个研究方向上与男性学者形成的显著性分野，以及重点高校及研究机构中分布较少的女学者群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侵蚀了女学者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影响力。当然，与西方社会学界上世纪中后期致力于无性别歧视，并不断持之以恒吸引更多女社会学者加入一样，越来越多优秀的青年女学者踏入中国社会学界已在CSSCI发文趋势中显现出来，中国社会学界也将因此而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 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再思考

**——从“地位实现”看阶层、群体、圈子**

**张宛丽**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编审)**

**摘 要：**

**一、已有的相关研究：**

1、阶层、群体、圈子、

阶层：课题组“阶层”报告

群体：利益集团（政治学）；利益群体（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争论）；孙立平：社会分层结构连续统上的利益“群体”（2013.8）

圈子：费孝通（20世纪40年代）;张宛丽：圈子与地位获得（1998）；罗家德（2012）2、表层结构（显结构）与深层结构（潜结构）：

列维-施特劳斯：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

中跟千枝：纵式结构

张宛丽：显结构与潜结构

**二、研究个案：阶层身份与群体、圈子**

海归群体的两个困境：“二度融入”、“孤岛效应”

1、个体在地位实现过程中“二度融入”的困境：是利益群体和圈子的阻隔，而不是阶层（地位获得）的阻隔。

2、群体在组织结构功能上的“孤岛效应”：

观察到的是：

a）作为个体的地位实现：各部门分布比例——比重越来越大，但仍是个体行动。

b) 作为“理想类型”的中产阶层的一个亚型，在社会结构功能上呈现的“碎片化”——“孤岛”而非“群岛”、“螺丝钉”而非“发动机”：

在与利益群体、圈子的交叉渗透中被割裂为个体“马铃薯”，而不是以一个阶层或群体或组织亚型在行动。

**三、问题：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再思考：从“地位实现”看阶层、群体、圈子**

1、是否存在阶层、群体、圈子的互动结构？其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交叉互动；从地位获得到地位实现过程的连续统。

2、是否存在表层（显）结构与深层（潜）结构？其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a）表层（显）结构：身份结构；符号认同与制度资源；被建构性

b) 深层（潜）结构：行动结构；关系认同与交往资源；建构性

3、二者的关系：相互渗透（“嵌入”）而非二元对立。

4、是转型社会的一个独特特征吗？

# 实现社会的自我发现

**陈映芳**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摘 要：**

一、

北京与上海，当今中国大陆的的两个超级城市，它们在这二十多年中神奇变幻的景象，早已为各种媒体的受众所熟悉。而**读者们在这本书中将看到的，则是这两个大都市中普通人的日常故事以及生活场景**。

“城市化”、“城市发展”，在经历了被呼唤被期待的喧嚣历程之后，如今已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的眼前，正支配着我们的生活。社会变迁不似文学故事般浪漫，今天我们看到的城市图景，远没有想像的美好──当以迪拜为代表的最新魔幻版城市在全世界面前惊悚登场之后，当2012年夏日的一场暴雨让北京城淹成泽国之后，现代城市的图腾正在失去先前的光环和信众。而有关“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美妙承诺，在中国，一如残存于墙壁上的老口号，它留给大多数普通生活者的，是难以明言的复杂況味。

但是生活还将继续，还在继续。在探讨问题发生机制的同时，致力于发现“社会的可能性”，这应该是不少学者投身于社会研究的深层动机。这些年来，在教学、研究过程中，鼓励学生们“到现场去”──了解生活者的逻辑，寻找社会的生机所在，这成了我不经意间持续多年的一项工作。**有些人倾向于将这类工作归入到“底层研究”的范畴，这或许是社会田野调查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所具有的属性。但在我看来，社会生活的实践原理，理应是“为了社会的社会学”的重要起点（就如同人性之于文学、生命意义之于哲学那样）。它也应该成为一般社会成员了解自身、理解社会的重要视角，无论是出于对社会命运的忧虑，还是因为对未来的向往。**

二、

**对每一个社会以及生活其中的社会成员而言，“社会调查”意味着什么？它首先意味着一种权力──观察社会、掌握社会实情的权力。**就象社会统计学在欧洲曾被称为“政治算术”那样，社会调查具有天然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有时体现为支配者对社会事实的定义权/诠释权的垄断，有时则可能以社会成员的自我阐释为形式──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权利。**社会状况“是什么”或“为什么”，这些对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都至关重要的信息及问题，谁有权去调查究明、谁可以来告知解释，在不同的社会，有着不同的制度和机制。**

社会学在中国的恢复，曾被理解为“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也被认为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学术装置之一。在这过程中，社会调查之于社会发展的有用性，曾被视为一种自明的常识。但是，有一些值得深究的问题多少被忽略了：**谁可能是调查的主体？为了什么而调查？如果了解社会既是权力或权利、也是能力，那么，谁该掌握这些权力、权利与能力？**

在今天中国的各种政府部门、产业集团的调研机构里，社会调查极为普遍地被运用于各种国情、舆情、商情等的调查项目。大学中的师生们，也因为各种科研项目的需要，忙着从事各类形式的调查。表面看起来，社会调查在中国不仅已经权力分散，而且门槛也极低（在欧美各国，社会调查有较严格的法律门槛和伦理约束）。但是，这其中存在一个要害的问题：**在政治权力和商业力量之外，代表民众自身权益的、独立的“社会调查”，既少且难！**

这涉及到两个问题：其一是，在有关社会调查的制度框架中，专业的调查机构及其从业成员的存在，以及他们展开调查的动因和基本条件，或者依附于政府需求、商家需求，或者则附着于大学科研项目之上（项目申报－审核制下的人文研究课题亦主要体现了对于学术研究的国家需要）。也就是说，在有关社会调查的制度中，**我们的“社会”、“社会成员”，其实多只是被设置为调查的对象、被诠释的客体，其本身却并不具备研究社会、了解自身的基本条件。**

在这客观的制度因素之外，另一个问题在于，社会成员自身，如何能培养出探究社会、了解自身的意识和能力？公民之成长、社会之成熟，需要社会成员具备相应的认识自我、诠释自我的基本能力，唯此才能成为社会权利、社会主张的声张者，成为推动社会自我变革的**真正主体**。

这样的能力培育，理应成为公民教育、大学教学的基本理念。但是，理念的确立及落实，始终还是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的大学中，学生们并不缺少参加各类专业实践的机会，在社会学这样的学科，由专业教师、政治辅导员以及团组织等等牵头的科研项目、调查课题多得让学生们应接不暇。然而，基于人们了解自身状况、关心社会命运等动因的、独立自主的调查研究，既缺少足够的鼓励和支持，事实上也并不被视为大学的使命或专业教学的任务。在现实中，以笔者这些年来的教学实践而言，鼓励学生们探索自己内心关心的问题、指导学生们从事真正以自己为研究主体的社会田野调查，这几乎成了大学中的另类教学实践。在教师，从体制课题或市场项目中腾出精力来，已是不易；在学生，业绩竞争需要之外的专业训练有何意义？而且，对不少学生而言，**“基于内心价值关怀的问题意识”**这样的要求，也意味着某种陌生的路径。

所幸，这样的教学理念与实践，在学生中不难得到对其意义的理解，且能得到热情的呼应。这些年来，我曾收到过无数让我感到非常满意的调查报告/研究论文，还曾读到过不少令人感怀的调查心得。学生们的社会调查报告虽然没有正规调查机构的报告所具有的某些权威性，可能也缺少媒体记者社会新闻的敏锐性、可读性，但是，**学生们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其自主的城市社会调查，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立于政治权力、媒体权力和专业知识分子学术权力的社会生活描述文本，它也为我们展现了 “自下而上的社会调查”的一种可能性，以及“社会自我发现”的途径之一。**

三、

在这批城市社会调查报告中，对于我们身处的城市社会，相信读者们既可能看到这些年中国城市发展的成就和问题、也可能发现社会的危机或希望──开放性、丰富性，是我对这份城市生活报告的突出感受，也是我期望大家能够认可的它的价值所在。

从中，通过京沪两地学生们的视线和笔触，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开发对城市传统、传统社区的破坏和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农民工”制度下各种乡城迁移人员的权益状况和生活困境的堪忧，以及各种城市贫困群体的生活现状等等。也许有人会认为，社会学者多关注社会下层，所以调查者更多地看到社会的阴暗面。但其实，社会田野调查工作者多只能接触到社会下层群体，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因此会更多地关注社会不公问题。**但是，所谓“社会下层”或“底层”的生活世界的复杂性，远不是研究者的所谓道义关怀可以描述清楚的。**此外，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社会调查者有条件真正进入到社会上层去做深入的调查，那调查者可能看到的，难道不会是更可怕的黑暗、更深刻的社会问题？**

但是，让人深感欣慰的是，我们的学生们从田野和生活者那儿带回来的，绝不是对所谓城市发展成就或城市问题的简单图解或罗列**。在丰富细致的场景描述、故事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调查者真实而真诚的观察立场、倾听姿态，也可以听到各种生活者对自己生活目标、生活策略以及价值规范等等的直白的或曲折的叙述、解释。**这些既不是出于意识形态宣传或学术研究需要所作的素材收集及经验裁剪的成品，它也不是居高临下的“关怀”或“批判”意图下形成的文本。

在这份报告中，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社会纽带**”在维系今天中国的城市社会中所起到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无论是艰难生存中的外来民工还是为上升流动而辛苦奋斗的年轻白领、大学生们，他们都一再地在告诉我们：家庭、亲属、同乡同学之间亲密关系、人们间的相互依存，对于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是多么重要；对亲人的责任、对孩子的期望，是如何在支撑他们面对各种困难、困境，并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在调研者们所描述的一个个城市生活故事中，我也读到了某种**社会共生的法则**。在为大部分公民所认同的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还没有建立健全的情况下，数百万“民工”、“外来人员”涌入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在不同族群身份、不同阶层/等级的各种人群之间，城市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的维系是如何可能的？这问题的答案我们不妨从生活者的这些故事中去细细地体味和发现──这些生活法则涉及到了人类社会的共生性、共同性，对我们每个生活者都会有启示。

在这份报告中，我还欣喜地看到学生们发现并描述了城市中各种年轻人的生活故事、以及他们独特的表达方式──对于同龄人、同代人群体的了解，让学生们显示出了成年学者所不具备的观察能力和理解角度的优势。而几篇有关校园生活、摇滚文化、涂鸦文化等的报告所描述的**城市青年的亚文化**调研报告，也让这份城市社会调查报告抵达到了“表达”的层面，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向我们呈示了社会的生机、以及城市生活/城市文化的多样性所在。

在这篇序言的最后，我要向郑也夫教授表示我的谢意。早在十多年前，因为《读书》杂志上的一篇小文（“城市社会：难以接近的上层与隐蔽的下层”），郑教授曾向我碾转致意，表示了对指导学生作城市社会调查这样一种教学实践方式的理解和支持。这本《双城记》，自始至终，是在郑老师的倡导和推促下成型的。

# 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的关联性及其政策研究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陈绍军 李如春**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 要：**气候变化与极端气候事件已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9个区县的实地调查，研究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的关联性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1）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全球气候变暖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一系列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导致了人口的迁移。（2）气候移民的主要类型有自愿性气候移民（含政府主导性和自发性气候移民）、非自愿性气候工程移民。（3）气候变化影响下的人口迁移决策过程可以描述为一个“两步过程迁移模型”。针对研究发现，认为现有的人口功能区和主体功能区划分，应该纳入气候变化的影响因素，出台相关政策，如人口政策、产业政策、土地政策、财税政策等来合理引导气候变化背景下人口的合理有序流动，以确保人口分布的合理布局以及人口、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女性情欲与自我表达：建构主义视角下的性话语研究

**裴谕新**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

**摘 要：**本文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以都市女性情欲经验为研究样本，集中探讨“新性爱故事”——包括自慰、网络性爱、多重性关系等——如何做为一种城市化体验与自我表达的载体，在性话语空间中找到出口。在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理论视角之上，本文借鉴性社会学家Plummer“后现代社会的亲密麻烦”的概念，以“性资本”、“情欲”、“情欲流动”、“偶像主义政治”等理论工具深入考察了女性对性行为方式、性关系、性别关系、个人生活与自我发展等多方面的考虑，层层剖析、都市化、国际化、市场、两性关系等等对女性性生活的重塑，也经由这些女性的个人生活与选择折射出中国都市社会的上行行进历程。

# 海市蜃楼中的核心家庭与现实中的个体家庭

**——家庭结构的“现代性”**

**沈奕斐**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摘 要：**当代中国家庭研究中非常主流的一种观点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家庭趋于小型化和核心化，核心家庭是普遍的、主流的家庭结构，代际关系将趋于独立。而现实却是，从父母帮孩子相亲、到结婚必须过父母关、到孩子父母帮忙带、到小两口离婚老四口法庭上吵……很多的社会事件都证明了今天代际关系的无比紧密和利益与共的特征，而这一点和核心家庭的理念相去甚远。因此，力图解释这种理论和现实的脱节就成为了本研究的起点。

2006-2009年期间，我在上海深度访谈了46个家庭(以中产阶层家庭为主)，询问了各种与家庭有关的问题，并参与观察了部分家庭的家庭生活。本文在这些个案基础上，以个体化理论为视角，反思核心家庭理论，力图证明核心家庭是现代化梦想在中国的海市蜃楼，中国家庭的结构是多元而流动的，逐渐体现出个体家庭的特点。

# 文化与国家——人类学家陶云逵眼中的边疆

**杨清媚**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摘要：**本文通过追踪人类学家陶云逵在西南进行民族研究的踪迹，以及他的相关书写，试图呈现陶云逵是如何思考自己与边疆的关系。从1930年代-1940年代，知识分子身处亡国、救国、建国的时代压力之中，边疆地区在成为他们的栖身之所的同时，也成为许多人意图实现国家理想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在这其中，陶云逵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中研院史语所，也不同于燕京学派的道路；既不把边疆视为破碎化的地方，也没有陷入地方主义的立场，而是通过文化区域的构建，力图靠近真实的历史层叠。面对国家权力扩张的压力，他坚持保持文化的独立性，坚持对文化多元结构的探索。他对边政学的热衷，恰恰以他对改造地方的冷静疏离为前提。而他对国家与地方社会两种想象之间的文化区域的构建，在唯物质论中逆流而上，从而为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留下空间。

1. 马克思，1972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footnote-ref-2)
2. 陈军民：2008，“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对比”，《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8卷第四期，Vol.8 No.4, Nov.2008，P45－48。 [↑](#footnote-ref-3)